

从技术代码到设计代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进步与局限

宋润婕^{1,2},高璐¹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文章辨析了芬伯格理论体系中的技术代码与设计代码两个重要概念及其理论背景与实践价值。技术代码在“批判的建构主义”中获得其意义,旨在揭示那些沉淀在规则与技术物中的价值和利益,为技术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近年来,芬伯格在“技系统”的背景之下提出了“设计代码”,将对技术的批判从技术物和技术理性扩展到了技系统和社会合理性之上。然而,这一概念的扩展暴露出技术民主化的若干局限,批判立场与技术民主化实践路径之间存在冲突,当今的技术民主化陷入道路困境。

关键词:技术代码;设计代码;芬伯格;技术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4-0036-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4.006

From Technical Code to Design Code: The Progress and Limitation of Feenberg'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SONG Run-jie^{1,2}, GAO Lu¹

(1. Institute of Natural Sciences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s,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both technical code and design code are differentiated and analyzed. The technical code acquires its meaning in "critical constructivism", revealing the values and interests from norms and artifacts and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Feenberg put forward the "design c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chno-system", extending the criticism of artifacts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to techno-system and social rationality.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exposes several limitations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 there exists conflict between the critical standing point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 current democratization of technology has been caught in dilemma.

Key words: technical code; design code; Feenberg; technology democratization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试图在实体论和工具论的中间地带开辟出一条新的技术理解方案和批判理论,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将技术设计的特征与历史文化发展相联系

的观点,从而将技术设计与文化规训或者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的技术哲学家,对 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方法的应用为他提供了打开技

收稿日期:2021-06-03

作者简介:宋润婕(1996—),女,安徽滁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

高璐(1983—),女,黑龙江大庆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物技术治理、STS 研究。

术黑箱,以具体技术物为对象来分解和辨识这种文化规训或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芬伯格发现并提出“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概念,并认为这是一种连接技术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或者说是知识和权力的重要本体论概念^{[1](P92)}。技术代码展现了价值和利益在无形之中沉淀到规则和工艺、设备与产品中的过程。技术正是通过技术代码的编写和组织,在显示其“中立”的特点下,又与社会的霸权意识形态相结合。然而,已有的对于技术代码的研究,往往在芬伯格的术语使用和理论层次上忽视了芬伯格时常使用的另一个与技术代码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设计代码”(design code)。^①虽然这个概念时常与技术代码进行互换使用,但是并不预示着这两个概念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并且在相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设计代码”,这一概念指的是在与技术相似的社会合理性领域,例如市场和官僚体制等场所中所发生诸如市场规则、官僚程序等合理性系统的标准化产物。设计代码通过类比的方式,将技术代码的解释力扩大到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科层制度,深化了芬伯格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继承的对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判。同时,从技术代码到设计代码的进路,扩展了技术民主化的路线和层次,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新的概念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因此,重新回到代码的理论概念,辨识技术代码和设计代码的理论内涵的异同边界,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中围绕代码的技术民主化的介入具有重要意义。

一、批判的建构主义与技术代码

(一)批判的建构主义

技术代码的提出具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在理论上,代码的概念是在芬伯格所提出的“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的理论框架下获得其意义的;在实践背景上,20世纪80、9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以及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编程的推广为芬伯格使用“代码”这一概念提

供了可借鉴的形式。

芬伯格认为批判理论的核心见解,即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殖民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分析说明,看似中立的合理性和技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情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负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指出的,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统治融合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这种控制形式以对人和自然的技术性利用为特征,通过技术合理性的思维和行为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与压制性进行辩护和开脱。但是,批判理论对于技术理性的分析实际上留下了两个缺口:一是技术理性的分析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不能进入技术物的层面并作出有效地说明;二是尽管当前技术政治学的发展,如环境保护与病患运动等都展示民主斗争在技术领域的进步,但是仍缺乏一种有条理的技术的政治参与说明。显然,批判理论没有关注并参与到这些进步之中。因此,芬伯格认为,英美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STS(科学技术研究)为弥补这两个缺口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

STS和批判理论在对技术专家统治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上持有相同的立场,更进一步地,通过案例研究,STS的研究将技术发展的多重不确定性以及灵活性展现出来,从而打破了技术发展仅依赖技术逻辑的传统观念。由此,STS揭示了利益、文化等社会性要素进入技术物并被转化为技术设计的过程,从而呼应了批判理论对于合理性形式做出的分析。同时,以行动者网络与共生产(co-production)为首的STS理论,倡导对称地打开黑箱,将技术的形成过程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秩序放在一张网络之中,技术—社会秩序是协同、同步产生的,这就使对技术物的政治与文化分析变为可能。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受到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公共争论所影响的社会建制。因此,技术的变迁就不是通过马尔库塞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而是通过冲

突性或者合作性的协商来达成,这些协商能够在没有掌握技术的普通民众或者技术的边缘人群,以及技术开发者和管理者之间进行^[2]。

因此,芬伯格的批判建构主义就是要在批判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整体框架下,通过 STS 的具体经验分析,揭示出一种特定的统治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通过在各种可替代的合理化中作出战略性选择,从而将这种利益表达嵌入到技术的程序、标准和产品生产的过程和方式中。

(二)技术代码

“技术代码”概念的重要性已经作为芬伯格技术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受到了广泛的讨论。在对芬伯格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中,技术代码往往会作为芬伯格技术观和技术民主化方案的基点进行阐述。格兰姆·克里克帕特里克(Graeme Kirkpatrick)认为,技术代码概念在芬伯格的技术政治学中具有核心作用,通过研究这一概念的本体论特征,他指出了其所具有的对于技术民主化实践的负面影响^[3]。一些学者也将技术代码作为理论工具来分析新技术的应用,比如安德鲁·弗拉纳金(Andrew J. Flanagan)等人^[4]。

在芬伯格的理论框架中,技术是一种高度情境依赖的、特定选择的结果。这种依赖和选择意味着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存在着一种选择的逻辑和规则,从而使技术设计和实行都按照相对稳定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存在着将技术网络中特定的利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转换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技术设计和技术实践方式,或者用芬伯格的话来说,就是将相对中性的诸如电路等技术要素依照社会文化要素的要求进行“编码”。而这种现象的产物就被芬伯格称之为“技术代码”。代码是一种最基本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技术选择得以按照资本主义维持自身发展需要的方式而进行。它“是在用技术上连贯的方式对一般类型问题的解决中的利益的实现。这种解决方式为技术活动的整个领域提供一个范式或样本”^{[1](P23)}。我

们或许可以从工业发展中的污染现象来理解这个论述,在早期的工业发展中,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往往被认为是决定技术体系发展方案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以环境和生态破坏为代价发展生产的技术模式成为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代码,这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的经济模式。但是,随着生态问题的严峻性的加剧,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对环境质量的考量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建设中,从而使工厂建设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都加大了环保降污的设备及设备研发,这一趋势正在逐渐取得规范地位,也就是说,环境保护逐渐被凝结到工厂和相关生产设备技术发展的技术代码之中,并且,大量成功范例(减少了环境污染与居民产生的矛盾等)成为了这个技术代码稳定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具象的、可以被辨识的技术代码,正是打开技术黑箱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即非唯一确定性的技术的生成逻辑。同时,在实体的技术规则之外,芬伯格认为技术代码在“一个统治是建立在对技术控制上的社会中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含义”^{[1](P93)}。一方面,技术代码构成了组织的独立性和生存原则,即将技术与组织的构建和社会功能的实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社会通过技术性的构建获得了合法性和存在形式,这就是“‘技术合理性’或‘真理的政权’”^{[1](P92)},从而技术体系的构造和解释在适应统治体系要求的同时,强化了这种统治体系的合理性。

社会与技术互构的特性预示着技术代码既是稳定的也是可变的。正是由于技术代码概念解释了技术现象的社会性本质,才使得经由技术代码实现技术变迁成为可能。技术设计是偶然的,而正是这种偶然性和非决定性打开了技术政治学的道路。尽管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自主性通过代码得以表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统治阶级就完全丧失了自主性。芬伯格认为,霸权体系的形成并不具有客观技术必然性,它不是由技术的本质所形成的固定的东西。尽管统

治阶级在整个体系中可以进行战略性的布局,但相对应的,被统治阶级也能够进行一种策略性的干涉,这种干涉可以实现技术的附属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包含了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这就是技术民主化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就可以不被看作是维护霸权的必然工具,而是足以塑造和开拓社会可能性的一种工具。通过技术的表达,被统治者的利益得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霸权体系也因此得到局部的变革。而为了实现这种“技术民主化”,芬伯格则认为,要“扩大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特别是要给那些缺乏金融、文化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接近技术设计过程的权力”^[5]。

因此,可以说“技术代码”,一方面避免了哈贝马斯工具论的狭隘性,揭示了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技术层面上的重叠;另一方面避免了马尔库塞技术实体理论的抽象性和悲观性^[6]。这一概念在芬伯格理论中具有基点式的作用。这种作用展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打开了技术物的黑箱,展现了在具体情境下对于技术的本质性洞察;二是它体现了批判的建构主义结合批判理论和 STS 的方式,从而将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具体化了;三是技术代码以及对代码的修改本身提示了技术政治学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构成了这种政治学的有效目标。

二、设计代码:技术民主化的拓展和对技术代码概念的迭代

(一)技系统^②中的设计代码

芬伯格在 2017 年出版的《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中》中,明确地提出了“设计代码”(design code)^③这一概念。设计代码能够通过行动者网络的“授权”(delegation)将一种行为准则转译为另一种,它不仅包含在技术设计中,而且塑造着技术规训。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代码与技术代码几乎具有相同的理论内涵。那么,为什么芬伯格要运用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来使一个已经受到广泛讨论和接受的概念重复化和复杂化呢?事实上,这两个概念的理论层次

和边界有所不同,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与芬伯格自身的合理性批判的连续性问题紧密相关。就技术代码来说,在一般意义上,它所指的是在具体的技术物或者是技术系统中,组织技术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的编码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对于技术理性所展开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探讨煤电技术与核电技术二者之间的技术代码的异同。但是,伴随该理论的延展,芬伯格认为技术理性其实并不是一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概念,而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更重要的是,芬伯格并不接受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与技术世界相分离的区别方式。因此,他在对社会合理性的批判上扩展了技术理性的概念,从而提出了基于技系统(technosystem)新的思考范式。

但是,这个技系统的英文并不是一般认为的“technological system”(这个被休斯使用的术语指的是使不同的资源汇聚在一起的技术系统),而是芬伯格为其赋予了独特意义的概念——“technosystem”^[7]。技术系统代表了“由专家通过技术科学构建起来的社会体系,任何对科学技术的理性应用,例如管理理论或工程科学”^[7]都是技系统,它是现代社会中政府与社会机构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通过打破技术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界,使得社会结构在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得以理解,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因此扩展到这种理性所延伸的社会合理性的批判。芬伯格认为,社会合理性的意义依赖于三条主要原则:等价交换、对规则的分类和应用、努力的最优化和效率的计算^{[8](P195)}。因此,一个具有社会合理性的社会是由市场、组织和技术围绕这三条合理性原则而构建的,而前两者在现代社会依赖广义上的技术性的形式和手段。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这本书中,芬伯格明确地说明了在这个意义上的设计代码的使用语境,指出技术的设计标准同样会发生在社会上其他合理的领域:“市场和科层制度比起技术有着更为明显的社会性,但是它们基本的设计标准是难以发现的。这些社会标准能够通过类似

于技术代码的术语来分析。”^{[8](P174)}这种指涉合理系统标准化的一般概念就被称为“设计代码”。设计代码有时会在说明书或规章中被明确阐述,但是更多的时候它们隐含于文化、规训和设计之中,需要通过社会学的分析来获取。这样一来,芬伯格就将技术民主化中的“权威”从技术物扩展到了由科学技术的理性而维系的社会系统之上——这种“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社会框架。

(二)对“技术代码”内涵的承接和整合

“设计代码”概念的提出具有其自身的进步性与理论背景。首先,通过使用设计代码而非技术代码,芬伯格强调和呼应了技术代码的行动性特征,避免了在之前的理论术语中所可能招致的民主干涉的后预性(即指技术的民主化参与只能发生在技术代码形成后)的误解,突出技术生成本身的开放性,并为分析新的技术物构建过程中不同层次的社会利益提供可能。其次,设计(design)一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响应了在STS学科和技术哲学领域发生的技术设计转向。对STS学科来说,设计打开了参与技术物与知识生产的大门,拓宽了理解 and 实践科学技术和社会互动的更广阔的边界^{[9](P150-180)},而技术哲学的设计转向体现了对人类与技术的道德性转译的常规理解的创新^[10],这或许提示了芬伯格使用设计代码这一术语更大的学科和认识论背景。

因此,设计代码一词在很多时候承接和呼应了技术代码内涵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构成了概念的整合和更新。在说明设计代码这一术语的含义时,芬伯格指出,设计代码“在社会行动者的日常语言和工程师或经理人的技术语言之间翻译世界观和利益,这种翻译让行为准则的社会意义隐藏在技术必然性的幕后”^{[11](P57)}。这句话表明设计代码扩展到了现代性技术合理性文化在管理和市场的领域。如果说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技术代码在实体层面上作为一种如何做出技术选择并且连接社会以及文化意义的技术规范,在本体论层面上作

为一种对于人造物的规定,揭示了技术领域的边界和进步性,从而彰显了社会通过技术网络进行自我构建的要求,那么在《技术体系》中通过设计代码,芬伯格就明确提出了代码的不同层次,即有关于具体人造物的代码与整个技术领域的代码(domin-code)^[7],从而将这种观点更加明确化了。某一专门技术领域的管理、设计、制度层面的规则便隐藏在领域代码之中,它规定了当前的技术社会中将机器和技术进步作为社会发展规范的形式,并且往往被翻译为更高层次的意义,例如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其次,就具体人造物的代码而言,由于在网络中存在着不同社会团体和力量,它们往往会对应着不同的设计目的与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造物中的代码就会具有更多的复杂性。而批判建构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将隐藏在技术合理性外衣下的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识别出来并且解释它们的关系。这种刻画,一方面超越了原先阶级的二元对立,建立了多重政治参与的空间;另一方面重建了一个技术物中多重实现的可能性。芬伯格用技术物的功能来说明这种多重实现的方式,指出不同层级的利益表达被转移到技术人工物的功能选择中。芬伯格不无赞赏地描述了其理想的技术形态:“通常,在最终的设计中,明显冲突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妥协。最有意思的当属那些案例,在其中,优美的创新可能满足所有不同的需求却无效能损失。”^{[11](P57-58)}

因而,设计代码的提出,展现了芬伯格在新的知识论和实践背景下的概念创新,将技术哲学转变为解释当代社会的第一哲学。但是,由于他并未勾勒出我们应如何辨识设计代码,以及即使看清了技术侵袭社会合理性与价值多样性的面貌,我们又该如何采取行动。这就为修改代码以及探索技术民主化的具体路径造成了障碍,甚至在其理论内部造成一系列矛盾。

三、从代码到民主化——技术设计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霸权

芬伯格将技术视为工具与文化的聚合体,

他对隐藏在技术背后的社会合理性,即技术代码与设计代码的分析,为技术的民主化变革提供解释与依据。从技术代码到设计代码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延续了芬伯格对于批判理论的吸收及其整体论视角,但更具价值的是,通过引入 STS 方法,他进一步将批判理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具体到了对技系统的建构与实践之上。如果技术是社会文化的构建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技术进行民主化改革与政治参与来解放技术并塑造技术的未来——技术政治学的潜力通过芬伯格的分析展现出来,但这种技术民主化又掉进了另一个技术哲学难以达成的政治承诺中,即如何通过对技术代码与设计代码的分析,来引导技术的民主化进程,从而真正达到批判主义的目标,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霸权性的社会合理性的改变。

与技术代码相比,设计代码以及技系统将社会合理性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在理论上扩展了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分析对象,将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通过技术性要素组织起来的体系和制度诸如市场和官僚制度等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对合理性所产生偏见的整体性批判图景。同时,设计代码的存在使得民主化的逻辑扩展到了这些领域,提供了辨识这些领域中看似中立的规则以及规范所负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切入点。从美国的例子来看,黑人在按揭贷款中存在着“红线”歧视,这种歧视并不是一种个体性的种族歧视,而是贷款分配体系的制度性结果,这一制度基于经济和社会学的理性推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风险与社区种族构成的相关假定^{[11](P166-167)}。因而,在这一规定的背后,就存在着可辨识的设计代码,这种代码使得对黑人的歧视与经济风险联系起来并将其转化为看似合理的规则条款,而民主化就是要公众发现这种“合规”的不合理之处,并且推动这一代码的改变。因此,设计代码将技术背后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中隐藏的不合理要素剖析开来,使得人们能够在技系统之中寻求对技术的民主化改革,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技

术政治学的扩展。

而这种设计代码对技术政治学的解释维度的拓展,实际上揭示了合理性在两个层次的表现:一方面是具体经验实例和具体技术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这种合理性在技术、市场和官僚制度等技系统的层次上所体现出整体的合理化现象。从芬伯格的视角来看,后者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下霸权性的社会合理性的形成,这种合理性通过引入控制和量化,并且同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相结合,使霸权变得具有合法性。芬伯格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代码将批判上升到技系统,将隐藏在技术之下的市场制度、政治偏向基于这一过程推动民主介入。

从设计代码所揭示的主体角度来说,如果技术政治学的发展有赖于对具体人造物的代码的改造和整个技系统的代码的改变之间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对技系统的改变意味着在当前的历史情境中对资本主义进行重塑,那么这种民主化的实质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种有导向的转化。设计代码将技术政治学的主要矛盾扩展到技术以及技术之外的技系统,并扩展到专家和普通民众的冲突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重塑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工具化理论的内涵下,芬伯格认为技术是两类知识的对象。一方面,“专家将社会影响以技术代码的形式重新阐释为技术规范”^{[8](P9)};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缺乏形式化的技术知识,但却具备可能已被专家所忽视的关于技术的副作用、技术情境和技术潜能的知识”^{[8](P9)},而技术民主化的目标就是有效地恢复和结合这两种知识,并且在这两者之间构建翻译的循环,从而将利益表达达到技术设计之中。就这个层面来说,围绕着代码的矛盾主体就应该是专家和普通民众。^④而如何把这组矛盾和芬伯格论证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矛盾相联系呢?芬伯格仅仅是简单地提及专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雇佣关系,希望以此来说明资产阶级的操作自主性是如何通过专家来维持的。但事实上,这个说明并不足以服人,因为专家、普通群众、统

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四个集合具有相对重叠性,而这个相对复杂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设计代码的使用引入了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和利益群体,围绕代码的民主介入的主体变得不明确,民主化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变得模糊。

如果芬伯格将满足不同的参与者的利益与需求视作是阐释和修改代码带来的行动价值,那么这种利益的表达就会不可避免地缺乏导向性。并且,这一过程依赖于对利益和需求的区分和识别,而这种区分和识别几乎都需要专家来完成。如果专家被视作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传导者,那么这个过程所构成的循环能否导向真正的进步就值得怀疑,因而这就要求对于专家的社会身份和作用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⑤此外,一旦技术和技术性体系向民主的参与开放,那么批判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是作为一种单独的话语还是它可以将自身同其他的参与性利益或话语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统一为一种整体性的对于合理性的反抗策略。因此,这种导向性的丧失使得对技术非决定的一面的强调反而可能陷入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从而忽视构建体系的困境。这就意味着即便做出了符合某些社会群体利益的技术选择,建立了某种技术规则,或许仍很难确立这种技术规则本身的规范性内涵,从而难以对社会合理性的整体状况与现代性产生有效的影响。这样一来,“现代性可选择则演变成为可选择权的僭越”^[12]。因此,虽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以社会为导向可以提供“较为广泛的技术评价研究,但缺乏能够辨识不同技术价值和平衡不同技术价值的系统综合理论”^[13]。

由此可见,设计代码和技系统的概念对于技术合理性批判的扩展,揭示出芬伯格理论的总体批判立场和技术民主化实践路径之间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通过一种 STS 式的微观民主化路径的批判来反抗由资本主义霸权维护的技术合理性的希望变得渺茫。这种民主化的困难表明了单纯的技术民主化本身可能无法达到对于总体社会合理性批判的要求,从现实

的角度来说,尽管技术的民主化与利益共同体的参与正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技系统中发生,但是一种体系性的社会或者文化的进步以及在其中被技术压抑的人性潜能的发展仍旧是不明确的。例如,当芬伯格将互联网的发展视为一种技术民主化的发展和对于已有的技术存在形式的挑战时,许多哲学家同样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同时创造了新的技术霸权,然而这种技术统治在芬伯格那里也同样是社会合理性的新的表现。斯蒂格勒通过其对于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研究指出,“这一信息机器注定要倾覆,所造成的只可能是欲望的崩溃,使欲望最终筋疲力尽,越来越受制于计算,受制于被确定之和的非延异的确定性。”^[14]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民主化对于技术设计的介入而得到改变的。

四、结语

芬伯格以批判理论、STS 为基本理论支撑,通过“技术代码”与“设计代码”两个核心概念为连接点和焦点,构建起了他称之为“批判建构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这条道路通过技术代码对技术理性系统的解构展开,再随着其延伸到设计代码,将批判扩展到对建立在技系统之上的社会合理性上,从而提供了理解技术的知识和权力的两面性的分析框架,实现了技术要素和社会要素连接的具现化。在实践上,他为我们提供了在具体的技术物和技术实践中,例如在人工智能和在线教育的发展中,定位和辨识意识形态与技术发展模式结合的有益视角,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民主化重新对利益和技术要素进行编码的切入点。

从技术代码到设计代码,这一发展的意义在于其拓展了技术民主化的有效边界,并且进一步整合了代码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但是,设计代码将解释推向了制度与文化领域,这对技术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通过技术民主化实现社会变革变得遥不可及。芬伯格在书中的疑问也暗示了这种局限的存在,即新的

宏大叙事能否从这么多特定领域积累的进步中涌现^{[11](P102)}?虽然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乐观的展望,但是即使我们无需回到20世纪对于技术和技术理性的悲观中,这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出现,或者说是整体性的嬗变无疑还是需要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技术政治学的内涵,以更辩证和更谨慎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技术社会及其进步的意义。

[注释]

- ① “design code”这一术语存在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一为设计代码(见《在理性与经验之间》(高海青,译,2015);二为设计行为准则(见[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M].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 ② 上海社科院译制版本为“技术体系”。
- ③ 上海社科院译制版本为“设计行为准则”。
- ④ 但芬伯格没有加以说明的是这种专家和普通民众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可靠和可变的,这就为参与民主化过程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同时,这也是STS中协同治理或协同生产的重要主题。例如,科林斯和伊万斯所提出的专长的“规范理论”,研究了“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的动态调适过程。探讨STS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的概括性研究,可参见:刘崇俊的《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 ⑤ 在这里说明专家群体的分化是重要的,同样这是一个STS正在研究而芬伯格却没有吸收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 [加]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 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STS[J].Thesis Eleven, 2017, 138(1):3-12.
- [3] Graeme Kirkpatrick. Transforming Dystopia with Democracy: The Technical Cod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A]// Darrell P. Arnold, Andreas Michel, (ed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Thought of Andrew Feenberg[M].Palgrave Macmillan,2017:117-138.
- [4] Andrew J F,Craig F,Jon F.Technical Cod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J].New Media & Society,2009,12(2):179-196.
- [5] 廖启云,毛建儒.芬伯格“技术代码”开拓的新视野及其价值[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4):59-64.
- [6] 吴致远.技术追问的后现代路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2-30.
- [7] 曾点,高璐.技术哲学在STS中的遗产——与芬伯格对谈[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3):15-25.
- [8] [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M].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
- [9] Ulrike Felt, Rayvon Fouche, Clark A. Miller and Laurel Smith-Doerr: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Fourth edition[M].MIT Press,2017.
- [10] [荷]彼得·维贝克.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M].闫宏秀,杨庆峰,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11] Andrew Feenberg. 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 [12] 刘同舫.技术可选择还是现代性可选择?——对芬伯格现代性理论前提与内在矛盾的批判[J].哲学研究,2016(7):108-113.
- [13] 李三虎.技术哲学:从实体理论走向间性理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5-14.
- [14] [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02.